

# 譜一曲英雄的輓歌

## ——《水滸》結局的悲劇意識

黃凱筠\*

### 〔摘要〕

水滸故事在中國人文環境裡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自兩宋以來，這個民間故事一再被人口耳相傳，或嘆其情節，或仿其行徑，或寓以深思，於是依其事而製的作品，可謂無代不有，甚而更遠播邇方，傳諸殊俗。

水滸故事陪伴中國人走過悠長歷史，不同的時代背景，呈現了不同的視角，發展出不同的精神風貌。百回本以招安而後討內征外鞏固國族的行動，來肯定其忠義精神；然而招安所獲取的並不是榮譽，而是死亡和犧牲。故事最後的悲劇寫在征方臘一役中，梁山英雄最後的挫敗、退反、分裂和死亡，具有洞觀全局、回覽前塵的深刻反省意味，是整個水滸故事中最具意涵的部分；凱旋未到京師就已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出家的出家，英雄已矣，一切絢爛歸於寂靜，面對水滸世界的挫敗與凋零，不由得使人有人間無常、天地無情之悲慨。

本文擬從故事意涵的忠義精神說起，逐步探討這部歷經三百餘年，集納繁多傳說的作品，結局所呈現的思想意識。

**關鍵詞：**忠義、墨家、水滸傳、施耐庵、悲劇意識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 一、前言

被譽為「宇內四大奇書」之一的《水滸傳》，<sup>1</sup>是一部膾炙人口的英雄俠義小說，明末清初文學批評家金聖嘆說：「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胡適亦讚嘆水滸為「永不廢滅之奇書」，《水滸傳》之精妙，由此可見一斑。故事由孕育至創造完成經由無數民眾口頭傳說，藝人講述記錄以及文人增飾修潤，歷時數百年之久，其通行版本繁複，風貌各異，綜觀整部水滸傳，是在整個官逼民反的主旋律中，奏起段段英雄豪情的頌讚。《水滸傳》創作宗旨是歌頌以宋江為代表的忠義，忠義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反對權奸、輔國安民。作者通過以宋江為首的各路好漢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動的演繹了整個社會「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現實，表達了對社會安寧、國泰民安的嚮往、對貪官污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愛國、除暴安良的理想藍圖。然而，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作者對招安結局的描寫。<sup>2</sup>

有人說作者是贊成招安的，覺得只有招安才是義軍的理想出路；有人說作者並不贊同招安，否則就不會用淒楚低沈的調子來描寫義軍招安後的遭遇，並為他們安排一個悲慘的下場，他之所以這麼寫就是為了宣告招安之路行不通，使後繼者能從中擷取教訓；也有人說作者對招安處理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既肯定、讚揚招安，另一方面有對招安有所批評。以上的種種見解都持之有據，言之成理，<sup>3</sup> 給人一定的啟發。

誠然，一部作品的結尾，就像作品的開端一樣，往往是作者精心結構的產物，因為結尾雖然像其他部分一樣，是作品的組成成分之一，更是有著特殊份量的部份。在這部份裡，不但要把作品之前所展開的情節矛盾等收束好，使作

<sup>1</sup> 本文論述所依據的版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由李永祜根據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容與堂刻本為底所整理出來的百回本《水滸傳》。

<sup>2</sup> 清人金聖嘆偽託古本，刪去招安平方臘等情節，成為七十回本《水滸傳》。

<sup>3</sup> 李永祜：〈評《水滸》招安結局的思想傾向〉，《名家解讀水滸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133-149。鍾學林：〈從梁山的三代首領形象看《水滸傳》招安與反招安的主題思想〉，《新余高專學報》5：3，2000.9）。

品的結構保持和諧、完整，更重要的是對作品所描寫的生活藝術做出評價，從而深刻的顯示作品的思想傾向。

## 二、忠義精神的呈現

### （一）故事寄寓各時代人民的心聲

中國古典小說一向具有強烈的傳說性格，如《三國》、《水滸》及《西遊》故事，都是從一真實發生過的人事起興，在正史官方角度之外，由民間隨意呼應衍生成文學形式，而漸鋪陳壯大，最後雖由文人結構，但仍是因勢而造，當中流露的已不是某個人的人生觀點，而是整個社會民族的集體意識；決定故事流傳不絕的是與廣大人心自然的呼應，這樣構成的作品深涵了「豐富的生命訊息，其與整個生存處境相融，從而反映出每個時代的文化特質。」<sup>4</sup> 以深厚民間文學為基礎的長篇小說《水滸傳》，便是經歷了兩宋之交到元末明初長達三百多年集眾人之力而成的結晶，<sup>5</sup> 最後由小說家施耐庵博采眾長去粗取精整理創作而成。<sup>6</sup>

《水滸傳》描述北宋梁山泊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草澤英雄之事蹟，故事雖屬虛構但題材是有一定的史實根據。<sup>7</sup> 當然，宋江起義的歷史事實只是為《水滸傳》雛形的搭建提供了基本的歷史依據，而它豐富生動的內容則有賴於群眾經年累月的生命鑄造，從最初的民間口頭傳說，到其後的藝人傳播，最終由文人

<sup>4</sup>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台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2000.6），18：1，頁239。

<sup>5</sup> 胡適：「《水滸傳》乃是南宋初年（西曆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水滸傳與紅樓夢》（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頁68）。

<sup>6</sup> 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爭論極多，本文不作論析，配合使用版本，采施耐庵一說。

<sup>7</sup> 如南宋·王偁《東都事略》卷十一〈徽宗記〉、卷一百三〈侯蒙傳〉，《宋史》〈徽宗本紀四〉、〈張叔夜列傳〉等。

整理加工成長篇小說，歷時三百餘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水滸英雄故事的內容不斷發展、豐富，為完成小說創作奠定了豐富的民間文學基礎。

水滸故事在長期流傳演變中存在著對起義反抗的歌頌、對被壓迫民眾的愛憎情感，以及因民族危難，廣大士庶把抵禦外族入侵、拯救國家危亡的希望，寄託於綠林好漢而產生對「忠義」的褒揚，這種種對後來水滸作者的創作思想有著一定規範作用，因而使《水滸傳》的思想傾向呈現出較為複雜的情況。小說結尾，作者更為水滸英雄們安排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結局，一是李俊、燕青等不願為官、移居海外，退隱山林者，他們無拘無束，怡然自得，善終天年；一種是宋江、盧俊義等奉「忠心不負朝廷」為圭臬，入仕為宦者，他們終遭奸臣所害，落得悲劇的下場；這兩種截然不同結局為讀者留下了無限的思索餘地。

總結言之，《水滸傳》之形成非一人、一時、一地乃至一代之創作，《水滸傳》之演變，從民間街談巷語，史家之點滴載述，說話人之鋪張誇敘，以及雜劇家之刻劃、渲染，經由文士綴集、修潤而成，可以說是古代文學史上，群眾集體創作和作家編著相結合的一部典範性的作品；「這樣的一部作品已具有某種程度的永恆性，它促使宋元明清至現代的人們去與之對應，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咀嚼出不同的意味，除了如史詩般反映了每個時代的集體心聲外，更呈現出某種與人性內蘊相共鳴的普遍精神。」<sup>8</sup> 這種普遍精神就是成就水滸故事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受到廣大民眾喜愛、眾口傳播、歷久不衰的原因。

## （二）故事呈現出的忠義觀

### 1. 儒墨忠義思想對《水滸傳》的影響

《水滸傳》作為古典文學名著，自成書以來，一直對中國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這本書雖然也宣揚了忠、義、仁、孝等觀念，但卻與正統儒家觀念迥然不同。正史《晉書》、《新唐書》、《宋史》等書的〈忠義列傳〉中，忠義之士為了對以君主為代表的國家履行忠義等原則，往往不惜犧牲一身、一家、一

<sup>8</sup> 同註4，頁238。

族甚至一支軍隊所有人的生命；與之相比，《水滸傳》則明顯表現出重視個體的價值觀，關注自身的精神自由與感性物慾的滿足。受到史傳文學的影響，俠義精神成為後世英雄俠義小說的主軸，其中關於「義」的闡述，各家不同。儒墨兩家都講義利關係，其中墨家所說的義與《水滸傳》的忠義觀較相近，是重個人、重功利的。以下便就儒墨兩家的「義」與《水滸傳》中的「忠義」作一簡單的述說。

### （1）儒家的「義」

在儒家傳統思想中，「義」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與「利」（物質方面的追求）相對應的一種精神上的追求。《論語·里仁》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告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離婁》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董仲舒解釋說：「人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強調的是義的內在價值，可見，在儒家看來，「義」是一種合乎禮義的行為節操，是仁人志士內心高尚的自我道德完善，儒家雖然沒有絕對的排斥功利，但對利的追求始終處於義的制約下，一再強調要見利思義。

在《水滸傳》中，「義」的思想與儒家的仁義觀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悖的一面，其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忠義」，指對國家與君主的忠心；二是「俠義」，包括對正義、公理的維持和對友情的忠貞。落實在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身上，每個人因出身、思想、經歷的不同，「義」的兩方面思想在他們身上的表現各有側重，各不相同。大體上而言，富豪出身或原來在朝為官的將領，他們對義的理解較偏重於「忠義」，如盧俊義、關聖、呼延灼等人；而來自平民社會的草莽英雄們則多以濟弱扶傾、救難解厄的行為以及對朋友的肝膽相照來表現他們對「義」的理解，與忠義不盡相同，具有濃厚的俠義色彩。顯然，從《水滸》的故事裡，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理想中的人物，應是集「忠義」與「俠義」於一身的人——宋江便是這樣一個集「忠義」與「俠義」於一身的人。可見，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義」對《水滸傳》創作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 (2) 墨家的「義」

把道德準則建立在自然人性 and 感性慾望滿足的基礎上，墨子反映了一般民眾的思想。《水滸傳》在這一方面比較接近墨家。墨家把義和功利聯繫在一起，說「義，利也。」（《墨子·經上》）「利」是墨家的一個根本概念，但墨子對於利尚無解釋，至墨經才有所解釋；《經上》云：「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經說下》云：「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利，彼也。」這裡用「利」來規定「義」的內涵，把仁愛和義的道德觀念和利益、功利相集合，清楚的表現了墨家義利統一，重視功利的思想，反映一般民眾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利互惠的美德。

相對於正史的忠義觀，《水滸》忠義觀多與功利、個體感性慾望連接在一起。成云雷在〈《水滸傳》道德觀個體價值取向的形成原因〉中對此作了分析：<sup>9</sup>

就忠而言，水滸英雄常常夢想「一刀一槍到邊上博個封妻蔭子」，是為了家族興旺繁榮。盡忠的另一個目的是在追求個體精神生命的永恆，所謂「青史留名」、「千年鼎食」。就義而言，結義、聚義、義氣，在賊官酷吏當道得勢的水滸時代，下層社會對這種團結互助是有利於生存的。水滸英雄並不諱言利，並不把義和利絕對的對立起來，江湖好漢見面或分手總要取銀相贈，如：宋江和李逵初見面即贈十兩銀子，魯智深和武松在見義勇為之後往往不忘踩扁銀器帶走……………

他們率直的追求自身慾望的滿足，在那個強權當道、酷吏當政、民不聊生的時代，水滸英雄結義、聚義常跟個體生存發展的功利聯繫在一起，也難怪戴宗路遇石秀，蓋嘆：「如此豪傑，流落在此，怎能夠發跡？」勸他去投靠宋江去過「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的快活日子，指明「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作個官人」的前途。

《水滸傳》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觀念由於對感性原則的兼容，肯定了個體生存的需要及其合理性，因而沒有成為僵化的教條，常常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變

<sup>9</sup> 成云雷：〈《水滸傳》道德觀個體價值取向的形成原因〉，《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6：4（2000.12），頁53。

通，在個個水滸英雄上有不一樣的體現，如：宋江這個書中的頭號忠義之士，在自己和結義弟兄面臨生命危險時，選擇的是「義」；一旦危險解除，就想通過對朝廷盡「忠」來出人頭地。而燕青、李俊等人，以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為優先，「忠義」作為道德行為的準則是有一定限度的。李俊體認到梁山聚義因為宋江的接受招安而將面臨窮途末路之時，就和費保等人在太湖小結義，滅方臘之後，李俊佯裝生病脫隊，和費保等人造船出海；太湖小結義在客觀上否定了梁山聚義，原因在於若繼續固守梁山聚義同生共死的諾言只有死路一條。燕青功成隱退，毅然掙脫宋江、盧俊義等人義氣的束縛，便是為了個體的慾望及生存。

## 2. 忠義難兩全

承前所述，《水滸傳》是由群眾集體創作和作家編著相結合的一部具有典範性及時代性的作品，對社會安寧及國泰民安的嚮往和對貪官污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愛國、除暴安良的理想藍圖。百回本以招安而後的討內爭外鞏固國族的行動，來肯定以宋江為首的各路英雄好漢的忠義精神，<sup>10</sup> 而這種精神最大的負載者就是作者傾全力塑造的宋江這個人物。

「忠」與「義」是極端矛盾的兩種思想，一方面，宋江對皇帝特別「忠」，始終沒有起過反抗皇帝的念頭，所以他把自己一切起義行為皆歸結於忠君愛國、為國除奸；另一方面，他對梁山弟兄又特別義。然而，皇帝與賊寇之間畢

<sup>10</sup> 金聖嘆刪去招安之後的情節，是緣於時代遭遇而出的自覺行為，在〈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的序文中，他不斷流露初以忠義許水滸之不可的心情：「嗚呼！忠義而在水滸呼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意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才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序二〉金聖嘆看待水滸這股勇悍盲昧之氣，始終是置之於水之滸、王土之濱的位置，其乃法外之徒、化外之民，而保境安民自當是忠義之士，忠義是人倫的份位，是體制中人我修治出來的一種實踐精神，鞏固國族真正所要憑藉的是這樣的精神，他認為招安不僅有失朝廷之尊，壞國家之法，更「是將反教之和，而令猖狂欲甚。」可知刪除招安後情節，有其時代遭遇下的省思。

竟是水火不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會黑暗的罪魁禍首，在這種情況下，對皇帝盡忠便是對弟兄、對群眾不義，反之亦然。但是，作者卻讓這樣的矛盾在宋江身上「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從「聚義廳」改「忠義堂」說起。

晁蓋曾頭市中箭身亡，宋江作了山寨主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這雖是一帶而過的細節，卻意蘊很深，堂名之變，反映了梁山好漢今後的變化。宋江是《水滸》中的核心人物，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九天玄女「替天行道，為主全忠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的法旨，直接說出了作者創作《水滸》的主要思想。什麼是「替天行道」呢？天，即是君王、朝廷，作者認為他應是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正常社會秩序，這本是聖君賢臣的職責，然而由於天子昏庸奸佞當朝，以致濫官惡吏橫行，魚肉人民，迫使人民將替天行道的熱望，寄託在宋江等梁山好漢身上。《水滸傳》中寫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義」，「聚義廳」突出的義與「忠義堂」標榜的義，其實踐內涵是不盡相同的。前者，如智取生辰綱晁蓋等八人聚義，劫法場白龍廟英雄聚義，大劫牢顧大嫂等的結義等，表現出來的是梁山英雄們對待義軍內部和受壓迫者關係上，所採取的藐視王法、生死相助的原則，這種義就是弟兄之間的「俠義」，當然是不「忠」的；「忠義堂」中的「義」是服從於忠的，「忠為君王恨賊臣，義連兄弟且藏身。不因忠義心如一，安得團員百八人。」（五十五回）義只是實現忠的一種手段，成了忠的附屬品了。

故事在「義」與「忠」兩大主線發展，前半段在強調各個富有生命活力的英雄，如何在同心協力、「義」氣相結的友情中，對抗政治、社會的黑暗勢力，開創出一片新的天地；後半段則企圖以理性化的方式，將這股力量，導向於效「忠」朝廷，為國家奉獻犧牲；但實際上，俠客的生命中，「義」與「忠」往往是相互衝突的。宋江擴充梁山泊的俠義為忠義，想要對朝廷盡忠，然而眼前的事實——當朝皇帝昏庸不明，任用奸臣，貪官污吏的結黨營私、貪污枉法，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世界裡——使得水滸英雄又怎能拋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職志，盡忠於朝廷、行忠義之道呢？從整個故事理我們瞭解到「義氣」的本質，與既定的法律、道德規範，勢必發生衝突；更何況，「忠」字背後隱



藏的詭計陰謀與權力鬥爭，也絕非這些草莽英雄所能承受的，當「忠」「義」不能兩全時，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各自選擇了屬於自己的歸路。

### 三、結局的悲劇意識

#### （一）、定義悲劇

就小說的結構要素而言，組成悲劇的六大要素為情節、人物人格、思想、措辭、音樂與場景。西方文學理論的遠溯，以亞理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為源頭，《詩學》中雖涉及詩之起源、喜劇、史詩等題材，但其主要論述皆在悲劇理論。在悲劇中，亞氏把情節稱為悲劇之靈魂，強調情節的因果律與行動的統一性，悲劇的重心就在於它的情節，它造成了憐憫與恐懼的情緒得以淨化，在其命運逆轉、發現、終致痛苦的情節主導下不僅使悲劇達成最佳的效果，更使劇中主人翁的思想與人格，在面對兩種價值選擇性的衝突下，導致破裂與矛盾，而顯現了悲劇的最高張力，這種人格衝突的樣態相隨應於情節律動的鋪敘，於緊密勾聯、前後一貫因果律的情節架構下，在幾部布局大開大合的典型西方小說中主人翁的演述，都可以得到充分的驗證。《水滸》故事便在這種種構成悲劇的要素下，呈現出動人的故事。

#### （二）《水滸》的悲劇論述

##### 1. 情節主導的《水滸》

以梁山泊的開合興亡，極有系統、邏輯地構築論述全局的，當以樂衡軍為典範。在她的視境中，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成了理解《水滸傳》的靈魂：

水滸以無比的精力，堅決的信念、宏偉的行動場面，來描寫一大群人的共同遭遇與命運，實在是被賦予了史詩的性格……我們感覺到一股偉大的意志力，自首至尾貫穿水滸全書。這一偉大意志力以梁山伯締造完成的那一時刻為它的極點。在這之前，這一意志糾合各類事件和人物，表

現為締造的努力過程；在這之後，這一意志力分化為相對立的兩種企圖（即招安與逃避招安）而互相抵消，以致於彼此吞滅。……這種積極的愛人救世的純正氣質，梁山泊本來是被賦予的，但由於種種原因，往後不但不能繼續發揚，反而逆道而行，這就是梁山泊悲劇嘲弄的致命打擊。<sup>11</sup>

樂氏建構的策略，是把重心鎖定在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上，而營造出《水滸》一股悲劇的嘲弄，其理解《水滸》的主題關懷，無疑是一情節性的原型架構，而梁山泊就是此架構的中心。梁山泊的命運流轉在締造完成之前，尚不失其替天行道的愛人救世理想，然而當宋江將梁山組織構成一種權力的模式，過多的征戰殺戮，以及力主招安，頓使情節導向逆轉、衝突，破滅，而合乎了必然的結局理論。梁山泊的命運流轉，在締造的上升情節與幻滅的下降情節，皆在一合因果線的邏輯架構中，構成水滸最大的悲劇張力，在情節架構中引出了在兩種價值選擇的衝突下，導致的破裂與矛盾：

梁山泊那一個公理正義、互愛共存的遙遠的王宮寶殿，乃逐漸在猛火烈焰中崩塌了。因之，以「殺人」為「救人」手段，終究不能避免作荒謬英雄的下場……喪失原先的稟素，實在是整個梁山泊沈落末途的徵象，而「正義」與「犯罪」成為必須同時接受的孿生子，這是梁山泊人們，也是我們正等待「正義」來救援的人類，所最悚然可畏的矛盾命運。同時梁山泊同死共生四海之內兄弟友誼的「義氣」，同樣的不但不能挽救梁山泊崇高理想的幻滅，反而促成悲劇，加深嘲弄……這種徹底的大逆轉，說明了人類善惡相結的悲劇性矛盾……而當「招安」與「反招安」，個人權力與集團意志成了兩個對立的主流意義，他們彼此抗衡，以致兩敗俱傷，同時幻滅……宋江招安成功，……就是梁山泊夢想的失敗……宋江的成功似乎使梁山泊原來相信為真理的東西變成幻影，而梁山泊以往的血淚與吶喊，成了一場無稽的惡夢……梁山泊這樣被毀滅殆盡，真

<sup>11</sup> 樂衡軍，〈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中外文學》1：8（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1973），頁 69-78。

彷彿古代史詩裡，英雄爭霸，不幸一方以永恆的悲痛結束了他的歷史，……遭遇永恆的覆滅……<sup>12</sup>

就這樣的詮釋路徑，把人物拉往悲劇上頭，整個梁山的締造與幻滅悲劇之形成，是在人物之沈酣於理想與幻想，力求所以達之，而堅執其行動與事業，終以其性格缺點之暴露、價值選擇之衝突而演成悲劇。顯然以情節為主導的論述，所成就的境界是一「悲劇」式的，就樂氏所表達的〈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所勾勒一「悲劇境界」，在與其他幾種以情節解讀論述成規相互關照下，幾乎指歸一西方式的悲劇境界。

## 2.從人物性情出發

唐君毅在談論中國的悲劇精神時，即認為水滸之境界絕非喜劇，亦非悲劇，只能謂之悲劇而超悲劇：

水滸之悲之所在，人皆不得而見之，唯見其人物之龍騰虎躍、驚天動地，而水滸之悲劇境界，亦深遠之至矣，非復可以西洋悲劇名之，謂之由悲深而悲樂兩忘，悲樂兩皆解脫，庶幾近之矣。……水滸之境界絕非喜劇，亦非悲劇，只能謂之悲劇而超悲劇。……在其中之一切人，除宋江外，皆只有現在，不思前，不想後，生死患難，一切直下承擔。……不思前想後，則一切現成，無聚無散，或一聚而無散。思前想後，則一切皆有聚散。<sup>13</sup>

就唐氏所述，《水滸》的境界是一超悲劇的境界，而這謂之悲劇又超悲劇的境界，呈現一中國式的悲劇意識。這種中國式的悲劇意識，如他所言：

中國文學之缺點之一，常言為缺西方之悲劇。莎士比亞之悲劇中，羅蜜歐與朱麗葉只相遇於墳墓。在中國之牡丹亭中，則必有杜麗娘之還魂。在哥德浮士德中，馬甘淚被焚，即魂飛天國，一去不返。而中國之長生殿中，則必求楊貴妃之重返人間。一般中國小說戲曲，大皆歸於大團

<sup>12</sup> 同註 11，頁 85-91。

<sup>13</sup>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79），頁 355。

圖。……中國小說戲劇中，雖少西方式悲劇，然亦非全無中國式之悲劇意識。紅樓夢、水滸傳、西廂與桃花扇等，皆表現一種中國式的悲劇之意識。……中國之悲劇意識，則為「人間文化」之悲劇意識。<sup>14</sup>

……，吾人可謂中國之悲劇意識，主要者，殆皆如紅樓夢式之人生無常感。人生無常感，即包含人間社會之一切人物，與其事業，及人間文化本身之無常感。中國之歷史小說戲劇，當皆具有此感。……中國之悲劇意識，唯事先依於一自儒家精神而來之愛人間世及其歷史文化之深情，繼依於由道家、佛教之精神而來之忘我的空靈心境、超越智慧，直下悟得一切人間之人物與事業，在廣宇幽宙下之「緣生性」、「實中之虛幻性」而生。而此虛幻性之悟得，亦不礙吾人最初於人間世之深情，既嘆其無常而生感慨，亦由此感慨而更增益深情，更肯定人間之實在，於是成一種人生虛幻感與人生實在感之交融……此常依於一種由蒼涼悲壯感而來之對人間之深情與責任感，為知中國之悲劇意識即是超悲劇意識，而可為中國文學之一最高境界。<sup>15</sup>

由此觀之，中國的悲劇精神是表現在這種人生無常感下虛實性的當下解脫，如《紅樓夢》所示：「人間一切接來自太虛而歸於太陰」或《水滸》之「納驚天動地於寂天寞地中」的情調。這種就「人間文化」之超悲劇意識，實涵蘊兩層意義：「蒼涼悲壯之人生無常感與對人世間之深情與責任感。」七十回本《水滸》收束於一夢，亦使整個水滸籠罩於一中國式的悲劇情調中；然在梁山世界的打破下，人物立功之百回本《忠義水滸傳》中，卻是由一種蒼涼悲壯、人生無常感而投入一人文世界中的忠義承擔，這種悲劇而又超悲劇的境界，說明中國之超悲劇意識，實是使人生價值性轉出至生命人格的成全上。

<sup>14</sup> 同註 13，頁 349-353。

<sup>15</sup> 同註 13，頁 359-361。

### (三) 《水滸》結局的悲劇意識

早在第一回，作者在解釋這一百零八條好漢的來歷時，就已指出他們是上應天心的罡煞星宿，由於魔心較重，下界無道，上帝才假洪信之手將他們放出，以替天行道，為朝廷效忠的。「那道黑氣直沖到半天裡，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而後一百零八條好漢各自出生成長，在不同的歷練及遭遇下，被逼上梁山，直到一百零八條好漢相聚，天火石碣宣告了眾英雄們的天命之職，而讓前面那些艱辛努力，終於獲得了一個最令人滿意的解釋。然而，就在同時，人間的一種召喚，卻又讓這批英雄好漢們回到了艱難的人世間，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在宋江的領導下，走向為國盡忠的招安之路，縱使也有反對的聲浪，然而卻在「義」的驅策下，全體均受了招安，走出山寨，「無從思慮的轉身投向一個命定的、新的犧牲行為。」<sup>16</sup>

所謂結局，指的是水滸英雄征方臘凱旋而歸至結尾所發生的一切情事。水滸英雄這次凱旋而歸就如宋江對張招討泣涕所言：「當初小將等一百八人破大遼，還京都不曾損了一個。誰想先去了公孫勝。京師已留下數人，克復楊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sup>17</sup> 由破大遼不曾折損一個到征方臘十停去七的變化，不由得令人有感嘆世事的變化無常，而五臺山上「同生同死」的誓言言猶在耳，如今卻全成了虛話，這種今非昔比之感，情何以堪？而死亡與不祥的之感想必已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一道陰影，使這番凱旋，表面上令人欣喜，但眾人的心情，其實非常的沈重。作者透過百姓的眼光對此作了一個最佳的詮釋：

東京百姓看了時，此是第三番朝見。想這宋江等出受招安時，卻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棉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朝見。破大遼之後回京師時，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戎裝入城朝見。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

<sup>16</sup> 樂衡軍：〈水滸的成長與歷史使命〉，《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頁297。

<sup>17</sup> 《水滸傳》，第九十九回〈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頁1019。

命文扮，卻是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剩得幾個回來，眾皆嗟嘆不已。<sup>18</sup>

使人嘆惜的是水滸英雄的氣數已盡。蓋水滸英雄之所以為英雄，全在其行俠仗義、反抗貪官污吏的精神，此一精神一旦落實為現實實在的權力功名，也就喪失其所以為英雄的本質了，英雄也就不再是英雄了。頭公服的打扮，象徵了英雄本質完全被遮蓋被掠奪，英雄已改頭換面，一切由人，完全違反了他們原來的本性和職志，這可以說是英雄墮落於現實的悲哀。

固然，對英雄本身來說，這可能是致命的嘲諷，但是當東京百姓出之以嗟嘆歎噓時，卻更觸動人心。他們所嗟嘆的不僅是「只剩得幾個回來」，其中更包涵了對英雄改頭換面的惋惜。凱旋未到京師，就已走的走（如燕青之隱退山野、李俊之浪跡化外），病的病（如林沖），死的死（如楊雄、時遷、楊志皆病死），出家的出家（如武松），英雄已矣，一切絢爛終歸於寂靜，面對水滸世界的挫敗凋零，天地無情之悲慨油然而生。其中尤以宋江身為水滸英雄之王，面對此慘淡局面，思念王將，最難釋懷，數度「洒然淚下」，這不免使人想起他曾經止戒燕青射燕之事。<sup>19</sup>當時梁山泊英雄皆存，宋江尚且賭物思情，聯想到：「天上一群鴻雁相呼而過，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卻射了那數隻，比俺弟兄中失了幾個，眾人心內如何？」言猶在耳，而今日水滸英雄已十停去七，雁行失侶，人亡事遷，宋江心中悽慘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宋江身為水滸英雄的首領，又是他力主招安，最後竟落得陣亡過半，不少弟兄紛紛退隱遁去，逃避功名，病死的病死，出家的出家，所剩不到十分之一二，又各分東西，這種局面，是他當初始料未及的，經歷了弟兄生離死別之後的宋江，對於招安之路又怎能無所不安？沒有悔恨呢？

在接受招安之後，水滸英雄即已喪失自己的國度，在戰場上，他們還可以找到自我的認同，然而在征方臘之後，他們卻瀕臨了一個特殊的人生處境與危機。弟兄的相繼陣亡，帶來了一種對生命無常的提醒，而將要面對的現實世界，

<sup>18</sup> 同註 17，頁 1025。

<sup>19</sup> 同註 17，第九十回〈五臺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燕青射雁〉，頁 922。

顯然又不是適合英雄根性的泥土，此時此際，水滸英雄所面臨的既是自然的無情也是現實的無情。從梁山泊「替天行道」的純粹理想、昂揚意氣，到重回人間的挫傷損耗，幾乎是不可能避免的悲劇。本不是求個人的榮光，但在人間要替天行道，就彷彿是以人的血肉之軀來背負上帝的事業，以人的有限性來挑戰大環境的無常變化。

宋江擴充梁山泊的正義感為忠義，欲對朝廷盡忠，但事實擺在眼前，當朝皇帝昏庸不明，奸佞當道，天下皆知，雖水滸英雄欲盡忠於朝廷，行正義之道，又何得而可？恐怕反而動輒得罪而已，所以忠與義都受到威脅，無所安頓，這是水滸筵席不得不散的情勢。水滸英雄所重者，不過是一個義字而已，是他們之間彼此的義氣，他們對此世界的正義感，使得水滸世界得以締造。而現在的處境，卻使一切都變了樣，一旦他們不再是獨立自足的集團，而是隸屬於另一權力中心，他們便將喪失自由而身不由己，原來的集團意識，手足之情以及共同的理想，都將被迫瓦解破滅，就如後來赴任的宋江等五位英雄，各處一方，不得輕意會面，稍一不慎，反而落得聚黨造反的罪名，弟兄之情，何以維繫？而在宋先鋒與哥哥不同的稱呼間，又有著多麼不一樣的感覺。

在最後的結尾，「便是宋江以生命的毀亡更新水滸精神」，<sup>20</sup> 當他繼盧俊義之後為奸臣所害，引了御酒中毒之後，招來李逵，給他藥酒吃了，臨別才告訴他：

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將你請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你慢藥服了。回到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以來此處楚州南門外，有個蓼兒洼，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也。<sup>21</sup>

<sup>20</sup> 同註 4，頁 249。

<sup>21</sup> 同註 17，第一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頁 1036。

李逵聽了後慨然而言：

罷，罷，罷！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sup>22</sup>

兩人垂淚相對。在梁山泊所有英雄中，李逵當是最天真也最率性的一個，在他身上，我們彷彿看到了人性的完全裸露，「是完全的動物性，最彰顯人物中那一股野性氣質，而宋江是水滸人物中最壓抑原始野性的人，因而對李逵有不由自主的、極深的愛，李逵是他內在自我的形象化，而李逵對宋江也莫名所以的完全依隨」，<sup>23</sup> 李逵宋江兩人仿如一體，兩人手足之情最為深厚，所以宋江毒殺李逵，便顯得逆天逆地、與理不合，充分展現駭人耳目、震撼人心的效果。

宋江的話反映了幫會首領的意識與心態，爲了保全集團的榮譽，不計一切犧牲，無所不用其極。爲了梁山泊「忠義」的清名，擔心李逵在他死後不受羈絆，逞其野性，「壞了我梁山替天行道忠義之名」，不得不對李逵親下毒手；然後，先公後私，又對他敘盡兄弟之情，約好死後也要陰魂相聚，「彷彿理性與氣性的互相成全」，<sup>24</sup> 激盪起一種悲劇性的情緒。當宋江以整個集團爲出發點時，他只能顧及到對朝廷、對梁山泊的忠，而不能顧及到對李逵的義，爲顧全大局著想，而不得不毒殺李逵，不得不犧牲弟兄之間的義氣。但是，李逵卻回報他以生死委之的毫無保留的義氣，在這種忠義不能兩全的情境下反諷放射出複雜而感人的力量，在他們的淚光中，我們彷彿重新看見了那熟悉的水滸英雄的豪情與壯志的閃動。兩人忠與義的意向各異，但彼此的互相體會結合，卻重新燃起水滸世界的精神火焰，引導水滸精神重返人間，他們爲水滸世界與弟兄義氣而共患難，同死同生的誓願終於實現，在這種緊密的結合中，宋江所代表的忠與李逵所代表的義，終於完全統一無間，成爲梁山精神不朽的雕塑。「水滸精神重返人間，行走必然是一個悲劇，在『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的餘音中，水滸精神又完整呈現，在他們走下梁山泊、顛簸人間，眾人看到他們挫動銳氣、文扮臣僕的形貌時，幾乎已忘了他們的英雄本質，

<sup>22</sup> 同註 21。

<sup>23</sup> 同註 4，頁 249。

<sup>24</sup> 同註 4，頁 250。



人間如此無奈，天地如此無情，最大的悲劇是『不殺生不足以成仁』、『不捨生不足以取義』，人身如此有限，仁心如此永恆。」<sup>25</sup> 這種英雄死生相契造成了水滸結局最感人的場面與悲劇性高潮。

#### 四、結語——不以成敗論英雄

宋江「自幼學儒、長而通吏」，在他的帶領下，梁山義軍不斷壯大取得了許多勝利，但他始終無法忘懷自己受過文明教育的洗禮，對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仍有極大的期望，對朝廷仍有許多幻想，因此最終他放棄了轟轟烈烈的事業，接受了朝廷的赦罪招安；不過，朝廷仍然權奸當道，宋江懷著「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之心，飲下了御賜的毒酒，自成一悲劇英雄之境界，宋江的矛盾與悲劇命運，其實也就是《水滸》無法逾越的思想障礙之體現。

「水滸有一個很突出恍然回顧與反省式的結局。於是水滸自然就比騎士或游俠表現了對人類生存情況更深遠的觀察。簡單說，水滸是比較具有嚴肅文學作品所不可或缺的，對人生真理的透視力，而水滸所以不為傳說故事和通俗小說的原始簡單性格所限，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透視力之下，所不得不導致的。這最後煞尾實的悲愴音調。假如我們譬喻水滸前半（招安以前）是一個憤怒的巨人，例如像撞毀不周山的共工，或張弓射日的后羿，他們無比的反抗和摧折力量，創造了自己如神的英雄形象；而水滸後半（招安後，尤其征方臘一役）就可以譬喻是一個飽經戰亂的老詩人，他徘徊在殘敗摧傷的戰場，他的胸臆漲滿了戰士的熱血，耳中迴響著廝殺的怒吼，可是他的心卻深沈而悲哀，他憂傷而疑慮地吟哦這戰鬥與死亡的故事，……於是原先的那跌宕之氣中，就轉出一種幽沈的心境來。過去種種憤怒和苦痛、罪過和流血，那如火如荼、如疾如狂的生命歷程，就彷彿赤霞燒天反映在沈靜的水面一樣，無比光燦逼人的景象上，卻只有沈寂與寧靜。水滸人物經過最後這場掩蓋一切的失敗與死亡，不僅

<sup>25</sup> 同註 24。

使他們粗確而騷動的生命獲得安息，更重要的是，使他們帶有血罪的整個故事，在這敗亡的大寧靜中，獲得洗滌澄清（這可以從最後徽宗夢遊梁山泊，宋江等已死而為神的情節喻知）。於是水滸的涵意也就越過了所謂社會寫實的命義，而成為人類的寓言故事。」<sup>26</sup>

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的事蹟，便是以這種輓歌式的旋律在個個時代綿延不絕的傳頌著。小說人物之解脫與成就，就在此人生無常的主題關懷中，超越了悲劇的意義，當下呈現出中國真正悲劇意識與精神；「成否誰能論，以一死盡身誠」當梁山泊僅剩的英雄完全為忠義而殉身死淨，宋江終於成功而淒厲地在這荒謬的世界中建立起梁山泊忠義的精神殿宇。所謂「感應」，所謂「顯靈」，正是梁山泊忠義精神在人們內心譜出的永恆交響曲。

## 參考書目

- 李 泉：《施耐庵與水滸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 周中明：《中國的小說藝術》，台北：貫亞文化，1994。
- 林慶陽：《水滸傳的人格世界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竺 青選編：《名家解讀水滸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 胡 適：《水滸傳與紅樓夢》，台北：遠流出版社，1986。
-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北：正中書局，1979。
- 孫寶義、勾聯璧：《讀《水滸》話人才》，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
- 徐秀榮編：《水滸資料彙編》，台北：里仁書局，1981。
- 馬幼垣：《水滸論衡》，台北：聯經出版社，1992。
- 張惠仁：《水滸傳與施耐庵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1988。
- 陳 穎：《中國雄俠義小說通史》，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傅正玲：《悲壯與蒼涼—水滸意境探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sup>26</sup> 同註 16，頁 302。

劉仁堅等：《水滸文化大觀》，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

樂蘅軍：《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山東：齊魯書社，1997。

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台北：里仁書局，1996。

方光珞：〈什麼是喜劇？什麼是悲劇〉，《中外文學》4：1，1975，頁148-161，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

成云雷：〈《水滸傳》道德觀個體價值取向的形成原因〉，《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6：4，2000，頁52-54、99。

朱志方：〈血淋淋的生命悲劇：評「水滸」的生命價值觀〉，《鵝湖》23：1，1997，頁48-51，台北：鵝湖雜誌社。

呂興昌：〈水滸傳初探——從性與權力觀點論宋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三）》，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9。

胡邦煒·吳紅：〈《水滸》思想傾向探源〉，《中國古典小說藝術的思考》頁33-48，1986，重慶：重慶出版社。

張出塵：〈水滸傳宋江政治神話之研究〉，《幼獅月刊》35：4，1972，頁45-52，台北：幼獅文化。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18：1，2000，頁237-253，台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劉運好：〈宋江悲劇蠡測〉，《古今藝文》24：4，1998，頁38-41，彰化：古今藝文雜誌社。

樂蘅軍：〈梁山泊的締造與幻滅——論水滸的悲劇嘲弄〉，《中外文學》1.8：，1973，頁68-91，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

## An Elegy for Heroes :

### The Tragic Ideology of the Ending of *Shui Hu*

Huang, Kai-yun\*

[ Abstract ]

The Legend of *Shui Hu*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Chinese's cultural. Since Song dynasty, this folk story has been narrating from mouth to mouth, and the public has praised the plots of the story.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s' of *Shui Hu* has been the models of a man of principle and virtue. In the old times, our ancestors to asked us to think deeply of some meaningful fables, and to request their generations to emulate or model oneself on. And every generation had the folklore to be eulogized everywhere.

The folklore of *Shui Hu* stays with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grow with it in different era, and different aspects with variety beliefs from the story. Regarding to the legends, those heroes helped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to face with troubles at home and aggression from abroad, and rescued people from foreign intrusion and saved the turmoil and chaos of war back that time. *Shui-Hu* heroes being order out of chaos, and thrive and were prosperous. The tragedy was about a battle of Fung-La; those heroes were vanquished, split up in their groups, and death at Liang San Po, and from the story, you may see clearly and understand thoroughly from the past and learned to make the self-examination from it.

And, the most implication part was the end of the story. Heroes were on their way home, and for the long journey, some died in the halfway, some got infected fatal illness and some even became monks or ran away in the midway home. You can see how those heroes faced their end from the beginning of bright and dazzling.

---

\* Huang, Kai-yun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om the folklore of *Shui Hu*, it shows directly how about the world of mortals mutable and changeable.

The thesis is focusing on the virtue and patriotism of the legend and to probe into the 300 years ago history progressively by gathering numerous folklores and stories. Ultimately, the ending is the story's conscious ideology.

**Keywords:** the Mohists, faithful and virtuous, *Shuihu Zhuan* 水滸傳, Shi Naian 施耐庵, the ideology of tragedy

